

Situation
and Feeling

处境 与 心境

留学心语
LIUXUEXINYU



SITUATION AND FEELING



阿牛 编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

122
347

Situation
and Feeling

处境 与 心境



SITUATION AND FEELING

阿牛 编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

ABY 97/14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处境与心境/阿牛编. - 沈阳: 辽宁教育出版社, 1999. 9

(留学心语/张双鼓, 靳平主编)

ISBN 7-5382-5484-6

I. 处… II. 阿… III. 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06665 号

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)
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: 787 × 1092 毫米 1/32 字数: 127 千字 印张: 5.875 插页: 2

印数: 1—5,150 册

1999 年 9 月第 1 版

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李晓晶

责任校对: 赵玉龄

装帧设计: 杜江

版式设计: 赵怡轩

定价: 10.00 元

聆听智者

(代序言)

几年前，约归国学者撰写“文化随笔”时曾说过：“在极短的时间、短小的文中，即可读到学者几十年的人生感悟，是很赚的。”有学者闻之，言：“原来，你约我们写稿，是这个目的？”“是呀，作为编辑，最先聆听智者的‘教诲’，怎能不‘赚’呢！”我诡秘地笑答。

如今，留学法国、德国、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六位归国学者的随笔合集于一册，尽管，学者们各有专攻，“随笔”只是“偶尔为之”，但，他们以不惑或知天命的年龄感悟的人生，达至读者，在读者，当是有益。

翻开首篇，与学者一同启程，先急奔数步，追上学者的思路，尔后，经几程慢跑，坐下来，以平静且平等的心态与学者对话，在语境的转换和思维的跳跃中，再静思、深谈……体味文品之时，或可触到隐涵在文中的——人品。

聆听智者，真的是很赚。

阿 牛

1999年2月于北京

目 录

聆听智者	1
------------	---



以“出世”的精神，做“入世”的学问	3
洛可可艺术与中国文化	6
启蒙运动与儒家思想	12
关于麦当劳的文化遐想	19



处境与心境	27
选择与定位	31
呼唤社会沟通	38
中国智慧之断想	45
人文精神的弘扬	51

重访慕尼黑	57
哲学家之路	64



李 振 声

在东京，遥想鲁迅	71
东瀛纪事	77
人与自然的契合	85
东京的乌鸦	92



马 兴 国

从日本人的金钱意识谈起	103
不忍歌唱	107
爆竹杂感	111
枫叶感怀	114



彭 兆 荣

另一种“资本”	123
“近而远”与“远而近”	127
鱼尾狮怪物	131
写在“水”上的文明	136
珍视“乡土知识”与“民间智慧”	141

海盗船里的中国古董	145
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

叶 舒 宪

“和而不同”看加拿大	151
庄子·彝苗葫芦·新疆木乃伊	154
早期希腊失落的女神	159
《佛教经济学》随想	165
“文化身份”的经历	170
我是谁?	175



以“出世”的精神，做“入世”的学问（孟华）

以『出世』 的精神，做 『入世』的学问

两年前的巴黎，曾有一位法国朋友向我提过一个问题：“中国的儒学是讲入世的，讲积极进取的；中国的道家又是讲出世的，讲淡泊无为的。两者的主张如此相悖，中国的知识分子如何在两者间选择？从总体而论，中国哲学到底是鼓励入世还是出世？”

看来，这位朋友对中国文化颇有研究，怕是真读过一些书的。他的问题提得也有水平，竟令我这号称“比较学者”的家伙一时语塞。但身为中国人，总得对自己祖国的文化给个“说法”吧？我于是坦然承认自己从未认真想过这个问题，“或许，”我思忖着答道，“取入世或出世的态度，全在于当时的具体环境。若得人赏识，就遵儒学的教导，积极入世，大展宏图；若怀才不遇，则循道家的原则，归隐乡间，弃世绝俗。”说此话



时，我眼前仿佛晃动起陶渊明的影子，似乎听见他正吟诵着那千古佳句：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”于是，便把陶潜的故事拿来为例，说得那位法国朋友连连称是，一脸心悦诚服的样子。

而我却为此忐忑不安起来：毕竟只是一点自我感受；没有经典的佐证，怎可乱言？为了恢复心理平衡，我回家后赶紧把手边与国学有关的书都拿来大翻了一气，总算给自己找到了些许凭据。

孔子曰：“邦有道，则仕。邦无道，则可卷而怀之。”（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）；孟子亦云：“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善天下。”（《孟子·尽心》）原来，这些老祖宗们早已提倡过“仕”与“卷而怀之”两种截然不同的处世态度了！

后来又读了一些其他书，证实了中国文化的融通精神终将儒家这“独善”的一面与老庄哲学的“无为”，甚至佛学的更加无为相结合，造就了一种“既入世而又出世”的传统。这些书中，我尤其喜爱冯友兰先生的《中国哲学简史》，言简意赅，读来真有茅塞顿开之感。冯先生的书是这样解释这种传统的：“入世与出世是对立的，正如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是对立的。中国哲学的任务，就是把这些反命题统一成一个合命题。……如何统一起来？……中国哲学以为，一个人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行动上完成这个统一，就是圣人。他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。”

正是这种既“入世”且又“出世”的精神，为千余



年来中国文人的立身处世确立了进退皆可，但以人格修养为最高标准的法则。

其实，冯先生的话一方面强调了道德修养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，同时也点出了中国文化能将儒道释融为一体的原因之所在。仔细思忖，他的话纠正了我答复那位法国朋友时的偏颇：“入世”、“出世”的选择，未必就是一个两难命题，一定要表现在不同的时间段上。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，不乏将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两相结合，既“入世”做事业，又淡泊名利之人。我写这些话时想到的是丰子恺先生。

记得一九八五年曾在《光明日报》上读过一篇纪念丰先生的文章，内中摘引了朱光潜先生的一段话，谈他对子恺先生追随弘一法师皈依佛学的感受：“我们并不感到奇怪。我们自己也看过一点佛书，觉得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就易专心致志去做。”

我那时正独处异国，以四十岁的“高龄”颇为清苦地在读博士，觉得从这段话里悟出了很多人生真谛，便把它抄录了下来，并且此后一直奉若圭臬，努力以“出世”精神，做“入世”的学问。

很后悔两年前在巴黎的那一个夜晚，未曾读到冯先生的书，亦未能想到丰先生这样好的例子。假如有机会再见到那位法国朋友，我会把这后一段故事补讲给他听。我想，这该算作中国知识分子对“入世”、“出世”问题的一种现代诠释罢。



洛可可 艺术与 中国文化



洛可可(Rococo),是盛行于欧洲十八世纪的一种艺术风格,因其在建筑及室内装饰中喜用贝壳、石子的漩涡状曲线而由法文“rocaille”得名。它源起于法国,而后影响到整个欧洲。

治艺术史的人,一般都不重视洛可可风格,认为它过于细巧、华丽,只适于表现艳情,而与重大主题无缘。但治思想史的人却不忽视它的产生和存在。因为这种艺术是在巴洛克(Baroque)风格的对立面上发展起来的,它一反体现神权、皇权的巴洛克艺术的威严,用轻快、纤细的线条,典雅、活泼的色调,细腻地表现了人的感情和逸趣。这恰恰代表了当时新型的市民阶级对现实、现世幸福的追求。

至于治比较文学,尤其是治中法文化关系者,如吾



辈之流，那就更要深究它的形成过程了。因为十七世纪、十八世纪，恰是中国文化传入欧洲的时代，无数事实都已证明，洛可可艺术在其成型的过程中受到了中国艺术的启迪，从中汲取了有益的养料。

欧洲对中国最先的了解是从丝绸和瓷器开始的。早在中世纪，中国精美的丝绸、瓷器，这些凝聚了中华民族智慧和美感的实用工艺品，就经由著名的“丝绸之路”，源源不断地运抵阿拉伯，再从那里转道欧洲，成为欧洲各国君主们收藏和馈赠品中的上乘之品。十七世纪初，海上霸主荷兰创立了东印度公司，开始直接与远东通商。经由阿姆斯特丹转运欧洲各地的中国物品深得各国宫廷的宠爱。到了路易十四亲政以后，此类物品已经开始在法国流传。

法国人与生俱来就喜爱精美细巧的东西，而制作精巧、散发着迷人的东方气息，且又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中国工艺品和其他特产，恰能满足法兰西民族的这种审美心理，很快就成为法国上流社会竞相争购的宠物。

就以青花瓷瓶为例。这种中国瓷器中的精品，深得法国王室的宠爱。一六七〇年，路易十四下令在凡尔赛宫内修建著名的特利亚农宫，专门陈列他所收藏的中国青花瓷瓶。为了能取得和谐的效果，建筑师在设计该宫外形时借鉴了南京的大宝光寺，又以青花瓷特有的蓝、白两色为基调来装饰室内。自路易十四以后，法国王室对青花瓷的兴趣有增无减，甚至经常委托商人们在中国瓷



都景德镇定制饰有西洋图案的青花瓷器。

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，愈来愈多的中国漆器、扇子、茶叶、屏风、泥人及各式小玩意儿运抵法国。从十七世纪末起，中国便成为了对法兰西人最富吸引力的国名之一。上自国王大臣、皇亲国舅、下至平民百姓，人人都以能拥有中国工艺品而自豪。在这样一种崇尚中国工艺品的氛围中，许多仿制品也应运而生，在民间广为流传。那时的法国，乃至整个欧洲，但凡有些身份、有点财力的人家都在家中设有“中国室”，或辟出“中国角”，摆放或真或假的中国货。于是，中国艺术就这样走进了千家万户，成为十八世纪的欧洲争相追逐的一种时尚。

这股“中国热”在十八世纪四五十年代达到了高潮。如果人们仔细研究一下这股浪潮的始末，便会惊讶地发现，商人们虽在不经心中充当了中国文化的媒体，但真正掀起这股浪潮，并在“中国热”中不断推波助澜的，是当时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们。这些神甫们出于传教的需要在中国习汉语、读经书，耳濡目染，受到了中国文化的熏陶，自然也就对中国艺术具有了一定的鉴赏力。经他们之手选择、绘制、发运回欧洲的画册、图片，成为当时的法国画家们汲取东方灵感的范本。华多(Watteau, 1684年—1721年)、布歇(Boucher, 1703年—1770年)、于埃(Huet, ?—1759年)都是法国洛可可时代著名的艺术大师。在他们的作品中或多或少都可辨析出



中国艺术的痕迹。

其中，华多的名作《舟发西岱岛》十分引人注目。那幅画的背景是用黑色描绘出一片单色山水。那远处朦胧的重峦叠嶂，在用色、构图及所表达的意境上带有如此鲜明的“中国风格”，以至于德国学者利其温(Adolf Reichwein)在没有任何确凿证据的情况下，仍然坚持认为画家是从中国山水画中得到了某种启迪。华多是否研究过中国的山水画，至今仍是一个谜，但他确曾为一个中国人画过素描。在华多的笔下，那位来自“天国”的模特儿被认真地研究，其细腻逼真，几近摄影。在华多为索宫及国王行宫拉米耶特所作的几十幅大型壁画中，“中国式”的人物、动物、景色也随处可见。

继他之后，布歇、于埃等其他画家也都纷纷效法，创作中国式的壁画、挂毯。汉学家们的研究告诉我们，这些画家的作品虽然充满了离奇的想象，但他们在创作时的确极认真地做过案头工作，不仅观摩、借鉴了中国作品，而且还阅读过许多有关中国的游记。

当代人在评价这些作品时，往往会以不像为理由，而拒绝承认中国艺术的影响。但是人们忘记了，这些作品产生于两百多年前，那时在法中间横亘着多少无法逾越的困难：没有现代化的交通、通讯设备，甚至连能使彼此沟通思想的最起码的语言工具书也难以寻觅。但就是在这样困难的环境下，当两种艺术有缘相逢时，它们之间的交流、对话和相互融合仍然是不可避免的。以平



涂勾线、以墨代色、崇尚自然、注重总体和谐与意境为特色的中国艺术，在与法国艺术家自身的传统相遇、匡正后，便产生了一种既有别于西方传统，也绝非中国艺术仿制品的艺术。或许它们什么都不像，但又分明带着这两种艺术的特征。这就是比较文学称之为“影响”的过程，而那些似乎什么都不像的作品，恰恰是艺术家的心灵在受到异国文化的启发萌动后孕育出的新生儿。

一七四九年，就在“中国热”已进入高潮时，一封介绍中国园林艺术的信件在法国发表了。信的作者是乾隆皇帝的内廷画师、法国传教士王致诚(Attiret, 1702年~1768年)。这位在法国和意大利受过最正统西方艺术教育的画家，却为圆明园内的曲径、假山、蜿蜒的小溪、千姿百态的亭阁所折服。他在信中写到：“这是人间的天堂。水池的砌法完全顺其自然，不像我们那样，要在四周砌上用墨线切割成的整齐石块，它们错落有致地排放着，其艺术造诣之高，使人误以为那就是大自然的杰作。河流或宽或窄，迂回曲折，如同被天然的丘石所萦绕。两岸种植着鲜花，花枝从石缝中挣扎出来，就像天然如此。”王致诚以一个艺术家的敏感，体悟到与西方园林迥异的中国园林的美学原则：师法自然，重自然逸趣而不尚人工雕琢；并以他的传神之笔，将这种巧夺天工的园林艺术介绍给了他的同胞们。王致诚这封信的发表，无疑为当时正流行着的中国时尚注入了新的内容。

当时在欧洲，正流行着一种新型的崇尚自然的花

